

财政控制论



顾晓平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财政控制论

顾晓平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责任编辑：龚 援
责任校对：段小青
封面设计：卜建晨
版式设计：代小卫

财 政 控 制 论

顾 晓 平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平谷县大华山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6.5 印张 160000字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2 500册

ISBN 7-5058-0438-3/F·354 定价：3.50 元

序 言

财政作为国民经济大系统中举足轻重的子系统，其功能特别体现在闸门式的宏观调控上。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借助于西方的最新成果“老三论”、“新三论”等科学理论，探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运行中财政控制的策略，是近年来经济控制理论和系统科学的研究热点。顾晓平博士的这本专著，就是从财政控制与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关系入手，以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讨财政子系统如何与金融子系统协同动作，实施有效控制，引导国民经济沿着有序、优化的轨道协同发展。他的出发点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几次大起大伏的原因，都是缘于对国民经济这个大系统在认识上缺乏能见度和在管理上缺乏能控度，从而发生了宏观失控和经济结构的畸形化。

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再生产原理，认识到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而消费的增长与消费的变化，又是以生产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为条件的。所以，他按消费是目的、是动力，生产是条件、是手段的原理，对消费与生产、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之间的依存关系作了定性研究，同时又有选择地引进了西方数量经济学方面的最新成就，并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原则进行了改造，作为定量研究的依据，从而使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辩证地统一起来。这是在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政策的制定之间建立起既具有可操作性，又符合客观事物动态发展规律的方法。这是顾晓平同志的新贡献。

比如，（1）他提出了静态消费乘数和动态消费乘数的概念，运用常态需求和累加需求曲线，作为制定正确的供应政策（产业结构政策、投资政策）和需求政策的依据，并以此作为配套运用经济杠杆的依据。这为宏观调控的可操作性提出了科学方法。（2）他在借鉴西方最新科学成果时，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修改了西方著名经济学者多夫曼、萨缪尔森和索洛尔提出的以消费结构不变，生产技术条件不变为前提的“大道定理”和以各产业部门等速增长的所谓“高速发展轨线”——诺依曼轨线。而依据马克思的“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再生产原理，引进了需求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各产业部门不同的投资时滞、外贸结构的影响等现实因素，建立了“修正大道定理应用模型”，求得了一条消费结构随着生产发展而变化，产业结构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和技术结构的变化而调整，使生产发展最快的、期末产出为最大的动态均衡发展轨道，并给出这条轨道的最优数学证明。这对我国用以制定科学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外贸结构的规划和财力分配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数量依据。（3）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是国民收入最大化的条件，也是效益与速度辩证统一的标志。由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人们的文化物质生活水平，所以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作为全民所有制主人的企业职工，争取在合理扣除之后的人均收入最大化当然是个合理的目标。所以，他提出的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转化形式——动态劳动者利益均衡的概念和核算的方法，正是缘于当前存在着分配不公和平均主义的倾向同时并存而提出的。在这里，有两点说明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这里提出的动态劳动者利益均衡，并不是要求各行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相等（那是平均主义概念），而是要求按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复杂程度给出一个合理的差别比例。另一方面，动态劳动者利益均衡，不是要求各行业间的人均留利均衡。因为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有机构成是不等的，因而企业需要生产发展基金同职工人数之间

并不是等同的。所以，生产发展基金应同有机构成和产业政策特别是技术政策联系起来，而劳动者个人利益（包括福利基金），则以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复杂程度为依据，各自给出一个大体的合理度。这一点既是符合按劳分配规律的，又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分配原则。具有创新性和实践性。（4）在财政收入、支出及收支差额等方面对国民经济的调控效应也作了有益的探索。

本书从总体看，立论新颖，逻辑性强，提出的新观点、新概念都具有可操作性，对现实有指导意义。我认为，这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有待发展和完善。为此，将此书推荐给财政经济部门和理论研究部门的同志们，作为制定政策规划的参考，并希望得到有关专家的指教和深化。

许 毅

1990年9月20日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需求系统的预测和控制	21
第一节 消费乘数：需求激励与结构偏差放大效应	21
第二节 我国消费结构预测模型评述	28
第三节 常态需求与累加需求	31
第二章 产业结构与计划子系统	40
第一节 均衡增长、非均衡增长与匀速增长	40
第二节 长期规划的制订：修正大道定理应用模型	51
第三节 中短期产业规划的制订	65
第三章 动态劳动者利益均衡	71
第一节 价值规律与社会基本经济规律	71
第二节 价值规律与动态劳动者利益均衡	74
第三节 动态劳动者利益均衡与非均衡	87
第四章 财政收入控制	104
第一节 税收在四方面的控制效应	104
第二节 产品税、增值税的控制效应	105
第三节 所得税的控制效应	113
第四节 国营企业利润上交比例的控制效应	117
第五章 财政支出控制	125
第一节 财政支出对积累、消费比例的调控	125
第二节 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的调控	129
第三节 财政支出对文、教、科、卫部门发展速度的调控	135
第四节 财政补贴的调控效应	140

第六章	差额控制.....	142
第一节	盈余控制.....	142
第二节	最优宏观税率.....	149
第三节	赤字控制.....	158
第七章	综合控制.....	164
第一节	企业模型.....	164
第二节	国民经济规划——控制——滚动模型简介.....	177
第三节	宏观调控操作规则.....	181
附录一	修正大道定理应用模型的细化.....	187
附录二	消费乘数表.....	190

导 言

(一)

经济改革的实践和近年来投资、消费双膨胀、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国民经济结构畸形化等失控症候的日益显露和加剧，将建立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突现在人们面前。如果说，在经济改革初期，针对着传统经济体制统得过死的弊病，“放权让利，微观搞活”成为改革的主体思路具有某种合理性和必然性；那么，在改革既取得伟大成就又经历严重挫折，能否正确决策关系到改革和国家的前途的今天，再不重视宏观调控问题的研究，再不尽快建立起可以操作的卓有成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而继续让“微观搞活”这一翼孤军突进，“搞活”就将成为“搞乱”，国民经济就将由有序向无序退化，宏观失控的局面就将进一步加剧，党中央提出的治理、整顿的任务就难以完成。经济改革进程的内在逻辑，使得对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研究成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瓶颈”。解决好这个“瓶颈”，是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键和前提。有鉴于此，本书选择“如何构造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作为研究和论述的主线。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是个大系统。它可以分解为控制系统和实施系统，其中实施系统可以分解为工业、农业、运输、邮电业、建筑业、商业等物质生产子系统和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非物质生产子系统，以及居民家庭消费子系统。而物质生产子系统和非物质生产子系统又可分解为行业子系统，进而再分解为部门、公司、企业子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实施系统中的每一级

子系统都各有自己的控制器，子系统控制器的功能是：接受上级系统控制器的信息和指令，搜集外界子系统以及本子系统内下级子系统的行为信息，以确定本子系统的目标和计划，同时向下级子系统发布信息和指令，控制下级各子系统协同动作，使该子系统的目标和规划得以实现。国民经济大系统中的控制系统的功能是：依据本国的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和资源约束（即依据本国国情），搜集世界经济、贸易信息（即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及本系统内部各级子系统的信息，据以制订系统目标和规划，协同和调节各子系统的动作，将它们的行动轨迹引导到符合宏观经济有序、均衡发展要求的轨道上来。由于宏观控制的参数信号和数量信号大多直接属于财政、金融范畴，有些（如价格、工资奖金限额）虽不属于财政金融范畴，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它们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财政子系统和金融子系统是国民经济控制系统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形象地说，它们是国民经济长河上游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控制闸门。因此，着重从财政金融与国民经济大系统的关系入手，探讨财政子系统如何与金融子系统协同动作，对国民经济大系统实行有效的控制，使国民经济结构有序化，合理化，是本文研究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一个特点。

近年来，“放权让利、微观搞活”似乎成了改革的同义语，谁多讲宏观控制，似乎就有僵化、保守、反对改革之嫌。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学者就构筑宏观调控体系发表了具有真知灼见的构想，计委、财政、银行的不少同志仍然为实施宏观调控作了扎扎实实的努力。惜乎收效不大，宏观失控的局面未被制止，反而日益加剧。究其原因，与这些研究和工作多是定性，而少定量分析，多是原则设想，而少具体的组织实现方法有关。事实上，宏观调控必须适“度”定“量”。量的过或不足，就是失“度”，它将使本来是正确的调控措施失效，甚至反而成为经济振荡的诱因。因此，对于何种情况下应当启动哪几种经济杠杆，这些杠杆的作用强度应有多大，杠杆之间应当如何组合，从启动经济杠杆

到产生效果的时间滞后有多长,这种时间滞后对调控效果有何影响,当控制的效果不理想时应当如何修改控制规则,等等,都必须进行细密周到的定量研究,才能构造起可操作、有成效的宏观调控体系。本书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为指针,从我国经济运行实情出发,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运用数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运筹学、递推规划、模糊数学、层次结构分析法、系统动力学等多种数理方法,建立包括国民经济长期规划模型、企业模型、居民消费和储蓄模型、财政模型、金融模型的模型体系,以模拟国民经济的调控和运行,不但给出调控规则,而且给出调控失效、经济运行偏离优化轨道时,如何修改计划,完善调控行为的方法,使得宏观调控体系具有可操作性。这些,构成了本书研究工作的第二个特点。

生产的终极目的,是满足现期和未来的消费需求。为满足未来的消费需求,现期必须投资,由此派生出投资需求;现代大生产造就了各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由此又产生了对中间产品的需求。生产力的发展所造就的这三种需求的结构,决定了必须有与之适应的产业结构。它是否合理,关系到社会再生产能否顺畅进行。然而在西方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是总量概念,宏观经济政策是指政府运用扩张的或收缩的财政、金融手段对总需求与总供给的调控。至于经济结构,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应当利用市场的力量自行调节,政府不必干预。当政府迫不得已进行干预时,则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化。西方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忽视经济结构的研究和调控,是被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决定的难于克服的缺陷,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难于摆脱滞胀困境的基本因素。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历来注重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指导下,对于产业结构、投资结构进行自觉的规划、调节和导向。这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所在。然而,在经济体制改革前的三十年间,主要依靠制定计划,给部门、企业下达指令,这样一些直接控制的手段来调控经济

结构和比例，财政金融对于经济运行的控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总量控制而非结构控制，因而其理论结晶（即“三平”理论）论述的也是总量平衡，而未涉及部门结构的平衡。经济体制改革的十年间，企业自主权增大了，投资基金分散了，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运用财政金融手段对于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实施间接调控，进一步发展“三平”理论，是历史提出的新课题。由于理论界一些同志主张将结构问题交由市场自发调节，使这一课题的研究，未能得到充分的展开。本书认为，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没有结构平衡的总量平衡，是短缺与滞存并存的虚假平衡。而结构平衡了，总量必然是平衡的。因此，在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控，不但是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而且是焦点所在。运用系统科学中的“老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新三论”（即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探讨如何运用多种经济杠杆协同动作，调控经济结构，使之有序均衡，是本书研究方法的第三个特点。

（二）

国民经济大系统对于子系统的控制模式，按照不同的控制行为，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按控制机理分类，控制模式可分为参数控制、数量控制、制度控制。所谓参数控制，是指中央控制系统通过调节税率、利率、汇率、价格等价值参数实施对经济运行的控制。所谓数量控制，是指中央控制系统通过调节财政收入、支出流量、货币供应量，乃至规定某些部门、企业的产出和投资的数量，对某些原材料的供应实施限额等，来控制经济系统的运行。至于制度控制，则是基于体制、机制、控制之间内在联系的控制模式。经济体制是指经济大系统赖以建立和运行的本质属性，是公有制还是私有

制，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经济机制则是指经济大系统内各子系统的内部构造及相互间的联系，不同的经济机制，对于控制信号具有不同的反应方式。一定的经济体制要求一定的经济机制与之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关系并存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国家就必须通过一系列方针、政策、制度，对企业机制、财政金融机制、计划机制、市场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也就是说实施制度控制，使这些子系统的行为顺应于宏观经济有序增长这一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用系统论的语言来说，所谓制度控制，是指通过改变系统结构，亦即变更经济系统的反馈环，来调控系统的运行轨迹。制度控制又可分为两个亚类，其一是受控系统制度控制，即通过改变实施系统的结构来变革其对于控制信号的反应方式，使之更灵敏、更稳定、更符合宏观控制意图。例如，税前还贷使企业利用贷款有利益而无风险，致使利率杠杆失去了应有的调节作用，这是投资失控的原因之一；改革税前还贷的制度，将能使企业对于利率杠杆产生较为灵敏的反应，从而提高经济系统的能控度。其二是控制系统制度控制。控制子系统也是由人组成的，也有其自身的局部特殊利益，若不加调节，这种特殊利益将会妨害控制子系统担当起调控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重任。控制系统制度控制，就是指国家通过方针、政策、制度，改变控制系统的内部利益结构，使其特殊利益与社会整体效益相协调，从而使其控制行为有益于经济大系统的有序运行。例如，通过改变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控制行为即发生变化；变动中央银行与各专业银行的关系，或变动银行职工收入挂钩办法（与银行结益挂钩还是与执行政策的效果挂钩），银行的控制行为即发生变化；这些都将直接影响企业子系统的行为，从而改变系统状态。

按控制变量与系统输出变量的关系分类，控制方式可分为程序控制、跟踪控制、最优控制与自适应控制。所谓程序控制是指

国民经济大系统的输出变量是已经规划好了的时间函数，控制系统随时监测经济大系统的实际输出与规划输出间的误差，并实施控制消除误差，使系统沿着预定轨迹运行。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并力争实现，就是一种程序控制。所谓跟踪控制，即控制系统实施操作，使系统输出能够跟踪捕捉一个变动的目标。例如，在经济大系统中，居民消费需求是经常变化的目标，国家应当实施有效的宏观控制，使供应紧紧跟踪捕捉需求。所谓最优控制，是指控制系统实施操作，使经济大系统的目标函数始终取最优值。但是，最优控制和最优规划，毕竟包含着人的价值判断，是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人的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反映，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也可能是有偏离、有失误的。如何检查出失误，从而纠正自己的认识，修改政策和规划，调整控制手段来清除误差呢？这就要运用自适应控制。所谓自适应控制，是指控制系统能依据经济大系统实际运行状态与预期优化轨迹的偏差，自动调整自身的结构和控制参数，以获得新的功能并使系统实际运行状态日趋优化。

按照管理方式来分，国民经济大系统的控制模式可以分为集中控制、分散控制、分层控制。所谓集中控制，是指国民经济各子系统没有（或者虽有而作用力很弱）自身的控制器，它们完全听命于中央控制器的指令而动作。这种控制模式易于达成子系统间的协调，适于中小型系统的控制运行，但对于国民经济大系统来说，中央控制系统无法实时处理极其浩繁的信息，因而它下达的指令有可能是不恰当的，或滞后于事态发展的；而各子系统由于缺乏自身利益的刺激机制，只是被动地执行指令，其动作也往往缺乏活力和生机。所谓分散控制模式，是指没有中央控制系统（或虽有而作用力很弱），各子系统在自身控制器的操纵下，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动作，这种控制模式，虽有较好的微观动力性能，但子系统之间难以协调，系统的总体控制性能很差。所谓分层控制模式，是集中控制与分散控制的扬弃与综合。在这

种模式中，子系统有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利益，子系统控制器各司其职，而中央控制系统通过发布信息和指令协调子系统的动作，使得系统的动力性能和控制性能得以兼顾。

此外，经济大系统的控制模式，按控制途径的不同，可分为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按控制变量施于实施系统的时间，可分为事前控制，实时控制和事后控制；按系统信息的反馈关系，可分为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按实施系统的能见度，可分为白箱控制（精确控制），灰箱控制（灰色系统控制），黑箱控制（模糊控制）；按所要控制的系统输出是总量（总供给，总需求，国民收入）还是结构分量（某经济部门、行业的投资，某种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可分为总量控制和结构控制；按照单独变动一个控制变量，还是配套变动两个以上的控制变量，可分为单变量控制和多变量联动控制；对于我们将重点研究的财政控制子系统的控制模式来说，还可按照财政业务，分为收入控制，支出控制，差额控制。

上述的各种控制模式是互相交叉、互为补充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在讨论财政控制系统时将按收入控制、支出控制、差额控制来展开研究，但其间将涉及上述的各种控制模式和方法。

（三）

虽然控制论直至1948年才由维纳创立，经济控制论更是六七十年代才发展起来的年轻科学；但是对国民经济实施控制，却是早已存在的历史范畴。

由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诞生和发展，直至本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控制模式，属于分散控制和事后控制。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亚当·斯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控制性能很有自信，他认为由于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作用，工厂主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能使供需自动

趋于均衡。后来,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现代均衡学派所提出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即CGE模型),又为“看不见的手”构造了精巧的数学模型,在这个框架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追求利润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通过模拟市场波动的“试错”而形成一组使市场“出清”、供需相等的均衡价格,在均衡价格体系之下,经济系统达成了所谓“帕累托最优”^①。然而,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因剥削剩余价值而必然发生的生产过剩危机,特别是本世纪30年代所爆发的特大经济危机,揭示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出的毛病,宣告了在国民经济大系统中实施以“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由放任”为特征的分散控制模式,是带有破坏性的。

于是,“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认为单纯依靠市场供求力量去决定工资、价格和产量,难以避免有效需求不足、失业和资源闲置,所达到的将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鉴于国民经济的不平衡,要由国家来组织平衡。他设想了一套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办法,即实行赤字财政,增加政府支出,通过乘数效应,刺激需求,以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并辅之以货币政策,通过利息率的升降来控制货币供应,从而间接地影响投资和消费需求。这些主张的实质,承认和强调了中央控制系统特别是财政控制子系统的重要作用,试图运用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去达成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施行的结果,确实减低了资本主义生产波动的幅度,使得十年左右一次的大经济危机转化为周期较短波动较小的振荡,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经历了三十年左右的在小波动中增长的“繁荣”时期,从而证明了在国民经济大系统的运行中,引入某种程度的国家干预的集中控制(财政金融控制),较之自发

^① 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的配置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情况:对该资源配置的再次变动,在导致某一方效用或产出增加的同时,必然导致其他方面效用或产出的减少。

的分散控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当然，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只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调整和修补，囿于私有制的局限，它的调节措施，只能停留在宏观层次上，而无法伸展到微观领域内，只能是对需求总量的控制，不能也无法对私营企业的决策运营施以有效的控制，从而也无法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这种控制模式虽然具有一些分层控制的色彩，总体上还是属于分散控制的范畴。它无力医治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的对抗这一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痼疾，因而对由此派生出来的失业、有效需求不足的病症，也只好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用持续的财政赤字刺激需求，终于使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先后陷入了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总结了凯恩斯主义的成果与问题后，发展了凯恩斯关于国家干预的改革主张，在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行总量控制的同时，运用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法，对于经济结构的优化运行进行了定量研究，制定了明确的产业政策，以此为依据，采取信息导向、政府说服等行政手段和贷款优先权、差别利率、差别税率等微观化的财政金融政策，扶持重点、支柱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抓住了优越的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机遇，从60年代以来，经济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强国，并与美国相抗衡。由于中央控制系统的有力，控制方式的多样（直接控制、间接控制、总量控制、结构控制和一定程度的事前控制——制订产业政策相结合），控制对象的全面（不仅对供需总量、产业结构实行控制，甚至对私营企业的投资决策、经营方向也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日本近三十年来的控制模式应当归入分层控制的范畴。日本经济的成就，可以看作是分层控制优于分散控制的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证，其经验值得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系的过程中参考和借鉴。但是，日本经济近年来已经失去了高速